

# 战俘与澳大利亚文学

---

张文茹

澳大利亚文学，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甚至澳洲本国人对自已国家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都知之甚少。然而，澳洲的战争文学却一枝独秀，有两部作品先后获得英国曼布克奖。一部是1982年获奖的托马斯·肯尼利的《辛德勒的方舟》，1993年由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获奥斯卡金像奖，享誉全球。一部是2014年获奖的理查德·弗兰纳根的《细道向北》，写的是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上的澳洲战俘被迫为日本人修建泰缅铁路的悲惨经历。

## 一、澳洲为何盛产战俘文学？

《细道向北》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澳洲有独特的二战战俘文学传统。战争文学，历来是属于战争英雄的，是胜利者的功勋簿，至少也是那些即使失败也能凭借聪明机智，终于虎口脱险的福星，很少有以战俘为主人公的。而澳洲文坛，却有许多作家非常热衷于书写战俘，甚至已成一种传统。就以近些年写被迫修筑泰缅死亡铁路战俘的作品为例，就有如2014年日澳混血青年作家克里斯缇娜·派珀的《黑暗之后》、2013年马克·戴普因的《灵魂之屋》、2012年罗伯特·瑞德里夫的《另一片太阳之下》、2008年托马斯·科内亚雷斯的《寡妇和她的英雄》、1996年艾瑞克·洛马克斯的《铁路劳工》等。为什么战俘文学会成为澳洲文坛的热门呢？这是由澳洲的国情决定的。

首先是澳大利亚在二战中，有大量的士兵被俘。二战时期，这个只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参军的人数就达一百万，其中三万七千人牺牲。因为适龄参军的人口更少，

所以几乎是每十个 18 到 35 岁的男子，就有八个参加了二战。也就是说，几乎家家都有男丁参加过二战，甚至很多家庭是两代人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比如，澳洲著名自传《幸运的一生》的作者 A.B. 费斯，就参加过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负伤回国，而二战时期，他的儿子又参军，最终为国捐躯。因此，澳洲人的战争记忆非常深刻。

而参战的人中，有三万人被俘，只有一万四千人活着回到家乡。而澳洲士兵被俘，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二战前期，盟军领袖和澳洲政府，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一方面盲目迷信大英帝国海军的强大，认为新加坡军事基地是不可战胜的堡垒。另一方面轻视日本的海军实力，甚至认为既然日本人制造的儿童玩具很差，那么日本人也造不出坚船利炮，不足为惧。而此时，澳大利亚三个王牌师，全部被派往欧洲和非洲战场，配合母国在中东作战，结果本土防御不足。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轰炸珍珠港的同时，开始攻打菲律宾，并一路南下，仅两个月就侵占了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地区。次年 2 月，日本攻占了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英军新加坡基地，造成大洋洲北部防线全面失守，一万六千名澳大利亚步兵被俘。事实上，澳洲士兵作战非常勇敢，比如科科达小径战役等都已证明了澳洲士兵的英勇，但因为英国在太平洋战区战略失策，加之兵力、装备严重不足，盟军迅速溃败，大量士兵被俘。

澳大利亚战俘的遭遇非常悲惨。日军拒绝遵守《日内瓦协定》中所规定的对待战争俘虏的具体规范，而是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他们。这些战俘一面要忍受热带丛林的炎热和各种疾病，一面还遭到了日军最残忍的虐待，被迫去抢工修筑泰缅铁路。这条全长 415 公里的泰缅铁路，每修筑一公里，就要牺牲六百人的宝贵生命，因此人们把这条铁路称为“死亡铁路”。这些战俘中的幸存者，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们中许多人都写有回忆录，讲述当年的遭遇。最著名的是一位被俘的陆军外科医生的日记——《爱德华·邓洛普日记——爪哇和泰缅铁路（1942—1945）》。爱德华·邓洛普的战时日记，记载了他作为一名陆军外科医生，如何“以非凡的勇气和正直保护战俘营中的战俘，为他们医治霍乱、疟疾、伤寒和热带溃疡”。<sup>[1]</sup>而《细道向北》的作家，正是“死亡铁路”的孩子，其父就是当年战俘中的幸存者。作者坦言自觉负有巨大的责任感，去书写父辈的战俘经历：

在人生中的某一时刻，我意识到我内心积蓄着一些东西，如果我不寻找途径将它们写出来，我就无法继续创作。我觉得有时作家承担一种使命，不管有多难，

[1] [澳]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潘兴明译，《澳大利亚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版，第 179 页。

都得去将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sup>[1]</sup>

其次，澳洲盛产战俘文学，而非英雄文学，与澳洲一直有平等主义和反英雄的传统有关。澳洲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度。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缺少国父、民族领袖这类英雄人物。因为它是由来自英国的流放犯、下级军官和社会中下层的自由移民组建的新社会。这些人出身不高，漂洋过海，历经苦难来到新大陆，当然渴望能摆脱旧大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所以，澳洲人希望在新大陆实现平等主义，人和人之间不再分高低贵贱。同时，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之初，每一个新大陆的居民，都要从事相同的拓荒和畜牧等劳动，他们需要互相依赖，互相帮助，所以这也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创造了可能。如此一来，早期的澳洲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心中推崇的是伙伴之间守望相助的“伙伴情义”，并没有谁是超出众人的“英雄”。即便是有类似英雄的人物，也都是些劫富济贫的罗宾逊式的绿林好汉，其中最有名的是奈德·凯利，他在林中抢劫过往富人的财物分给穷人，在澳洲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澳洲不盛产也并不崇拜高高在上的英雄，反而常常有反英雄情结。以 A.B. 费斯的自传《幸运的一生》为例，费斯从一战中最残酷的加里波利战场上侥幸活了下来。回到家乡，受到政府组织的各种欢迎队伍的热烈的欢迎，人们像是欢迎英雄一样排着队迎接费斯。然而，满身伤痛的费斯行走在欢天喜地的人群中，并没有丝毫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他心中所想的是“如果当初我够聪明，就绝不会去参加这场战争”。

## 二、澳洲战俘文学对日本之态度，为何由仇恨转为和解？

澳大利亚战俘文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人对旧日仇敌——日本的态度。澳洲战俘文学在对日态度上，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从对日本的仇恨转变为和解、同情、宽恕。前者，以内维尔·舒特的小说《爱丽丝小镇》（1950）为代表，内维尔认为日本军人犯下的那些残暴的罪行不可饶恕。而之后的澳大利亚战俘文学的主流态度，更多则是以和解而非仇恨之态度对待日本，即“仇恨软化为对人类坚韧不拔精神的肯定和一定程度的和解”。<sup>[2]</sup>为什么对日和解态度，会成为澳洲战俘文学的主流价值观呢？

[1]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er-prize/11163437/Richard-Flanagan-I-nearly-worked-down-mine-after-writing-Man-Booker-Prize-winner.html>

[2] [澳]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潘兴明译，《澳大利亚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79页。

首先，是政治原因。因为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要依靠美国的支持，而美国希望把澳大利亚和日本作为其在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澳大利亚也希望在太平洋地区能保持稳定和均势。因此，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是“亲密”的伙伴关系。这就要求在主流价值观上，澳大利亚需要保持与日本良好之关系。比如，澳大利亚右翼总理阿博特，在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澳时，曾公开表示：“我们羡慕这些士兵（二战时日军）的技能及完成任务时的荣誉感。或许我们也从心里感觉到，最凶猛的敌人也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因此，官方意识形态支持以和解态度，淡化二战创伤。

其次，是澳洲作家的反思战争的视角。他们没有一味地把日本士兵刻画成魔鬼，而是试图从人性相通的部分中，去解释日本士兵何以如此残暴地对待战俘。以弗兰纳根的获奖作品《细道向北》为例。弗兰纳根借由描写战后日本士兵回归日常生活，让读者看到这些残暴地虐待和杀害战俘的日本士兵，也不过是些我们日常见惯的普通人。他借用日本诗圣松尾芭蕉的代表作《奥之细道》的意象，作为自己著作的题目，就是以此象征幸存后生存之艰难，无论是对幸存下来曾经的战俘，还是对当年虐待战俘的日本士兵。

弗兰纳根是如何解释战争是怎样使得普通人变成残暴的杀人恶魔的呢？他在书中想象日本军人中村修二，在内心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正义性辩护：“他告诉自己，通过服役于最高的善，他发觉自己不再是一人，而是献身于集体，此时的他能够做出那些最可怕的事。如若不是有自己服役于最高的善的信念，他也会认为这是罪恶之举。”<sup>[1]</sup>中村修二感到自己的行为是“罪恶之举”，但是为了最高的善，他愿意做“那些可怕的事”，他愿意献身。弗兰纳根对日本军人这种逻辑的推想，在日本学者大贯惠美子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惠美子研究了自杀式轰炸珍珠港的日本神风攻击队队员的心理状态。这群神风敢死队的年轻军人，一般被外界想象成一群被洗脑的无知的亡命徒，愚昧地以日本天皇为神，而甘愿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但根据惠美子的研究，这些队员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但都完成了高中教育，而且是对日本和西方思想都有所涉猎的有知识的年轻人。那么，这样一群人为何会成为杀人机器呢？惠美子提出了当时在日本各地复兴的樱花的这一传统意象，对这些青年学生的影响：

---

[1] <http://whisperinggums.com/2014/10/11/richard-flanagan-on-poetry/>

他们继续将樱花视作精神纯洁、品德高贵的象征。这里的“纯洁”和“高贵”是指作为对社会一分子的个人应当担当起对全社会和全人类的责任，无条件地献身于某项伟大的事业，从而超越个人的渺小与生命的短暂。

因此他们并不是为了天皇献身，而是为了在为伟大事业的牺牲中超越自己。<sup>[1]</sup>

日本军人中村修二“发觉自己不再是一人，而是献身于集体”，不再有一己之私，而是完全抛弃了自我，选择献身。而献身的对象，两者都指向了“善”，超越自我、牺牲自我的目的是为了“至高的善”，“需要加以疏远、顶礼膜拜，向它牺牲的善”。这种逻辑，不只出现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也出现在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殖民掠夺中，康拉德《黑暗的心》的叙述者马洛，是这样评价那些刚果殖民者的：

他们是征服者，而要当个征服者你只需要有残暴的武力就够了……为了获得所能获得的东西，凡是可以到手的，他们都去攫取。这不过是在用暴力进行掠夺……征服这块土地，这主要是指从那些肤色不同，或是鼻子比我们稍塌一点儿的人手里抢走他，这并不是一件漂亮的事情，如果你十分仔细地去看它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点。唯一能够给予补偿的是那种观念，那种掩藏在它背后的观念；这不是一种感情上的借口，而是一种观念，以及一种对于这观念的毫无私利之心的信仰——这是一种可以去加以疏离，对它顶礼膜拜，向它贡献牺牲的东西。<sup>[2]</sup>

这里所谓“背后的观念”，就是相信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有更多的善。英国殖民者比非洲当地的这些“野蛮人”拥有更多的善，为了这种善，殖民者愿意做“一件不漂亮的事”，用武力掠夺殖民地人民，甚至也愿意牺牲自我。这两种经验有其共同性，感受到这种经验的人都在这种经验中体会到了超越自我甚至牺牲自我的快感。

而日本樱花精神和西方宗教精神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02)中，记录了许多声称有过宗教经验的人。所谓宗教经验，是指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其中，一个人描述说他有一天突然感到从天上照下一道光束，呈现在眼前的是通往天国的阶梯，

[1] 刘握宇：《扭曲的樱花》，《读书》，2014年第12期，第113页。

[2] [英]康拉德：《黑暗的心》，王智量译，赵启光编，《康拉德小说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88—489页。

他看到上帝向他张开双臂，欢迎他同享天国的荣光。经过这次“宗教经验”后，此人一改往日庸庸碌碌、不学无术的生活，开始改过自新，奋发向上。这是因为宗教的力量。他在那通往天国的阶梯上看到了希望，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宗教的力量是给人以归属感，赋予平凡生命以非凡的意义。自我是渺小的，但渺小的自我得到了上帝的关照，将在上帝所在的天国拥有一席之地，今日所为都将成为来日获得上帝认可、永居天国乐土的凭证。而在没有获得宗教的经验之前，个体生命如同草芥尘埃一般无意义的存在，不知其由来，未解其所归。个体承受着无所归属的遗弃感和无意义的焦虑感。这和日本军人中村修二感受到自身渺小，而愿意投身到一个更加伟大事业之中，并为之牺牲的道理是相通的。

日本军人的疯狂和宗教徒信仰的虔诚，在原理上有相通之处，即都是一种超我完全控制自我的体验。弗洛伊德将人格划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我们习惯于谴责本我是欲望的渊藪，如同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说：“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污地，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藪，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而超我则被认为是负责拯救人类，免于最终落入本我私欲的深渊，因为超我是一股内化后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力量，是作为人类拯救者的形象出现的。此时的超我即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权威，因为它是道德的代表，它的一切决定就代表着向善的追求。当人们在强大的超我的控制之下，选择放弃了自我，而将自我完全献身于超越自我的价值追求之中，人类就很容易成为某一事业的工具、某一信仰的工具。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说：

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进程，外部性的强制逐渐内化了，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代理，人的超我接管了这种强制……每个儿童都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转变的过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成为道德的、社会的存在。超我的这些力量的增强是心理领域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那些发生了这种转变的人就从文明的敌人变成了文明的工具。<sup>[1]</sup>

这就是超我强制性地以文明之名，迫使自我牺牲变成文明的工具。从而让人们完全放弃个人的道德判断，为一个无须怀疑的“至高的善”，个体可以突破原有道德底线，去杀戮他人。让个人放弃一切权利甚至包括最关键的生存权，甘愿献出生命的代

---

[1] Sigmund Freud, *The Future of Illusion*,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 p. 11.

价。这种自我的牺牲，它以追求至高的善为名，行最大的恶。以维护集体权利之名，行消灭个体权利之实。人们习惯性地谴责本我私欲的同时，却也习惯于忽略超我不断爆发出的更为强大的破坏力。当年的日本士兵，正是这种超我激情的牺牲品。

可见，弗兰纳根恰恰是在批判阿博特总理所说的“荣誉感”。他所塑造的《细道向北》的主人公道瑞葛·伊万斯，这个被世人看作充满道德感的英雄，却被弗兰纳根塑造成一个自身非常讨厌道德又极其讨厌被视为英雄的人：

道瑞葛·伊万斯痛恨道德，痛恨人们崇拜道德，痛恨那些假装有德之人。岁月流逝，人们越是称赞他为道德楷模，他就越痛恨它。他根本不相信道德，道德不过是经过掩饰的虚荣，时刻等待着赞许的掌声。<sup>[1]</sup>

澳大利亚虽是文学小国，但她独特的战俘文学，使她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别具风采，时刻提醒人们在那些雄壮、威武、光荣的胜利者的背后，还有无数遭受了巨大苦难的战俘们，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坚韧不屈，应该有人写下他们的故事。

---

[1]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w/the-narrow-road-to-the-deep-north-richard-flanagan/1117541928>